

知识分子图书馆

消费文化读本

罗 钢 王中忱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知识分子图书馆

消费文化读本

罗钢 王中忱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消费文化读本/罗钢, 王中忱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6

(知识分子图书馆)

ISBN 7-5004-3869-9

I . 消 … II . ①罗 … ②王 … III . 消费—文化
IV . C91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2260 号

责任编辑 汪民安
责任校对 石春梅
封面设计 李颖明
版式设计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插 页	2
印 张	19.25		
字 数	463 千字		
定 价	3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知识分子图书馆》编委会

顾问：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主编：王逢振 J. 希利斯·米勒

编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J. 希利斯·米勒 王 宁 王逢振

白 烨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李自修

刘象愚 汪民安 张旭东 罗 钢

章国锋 谢少波

总 序

1986—1987年，我在厄湾加州大学（UC Irvine）从事博士后研究，先后结识了莫瑞·克里格（Murray Krieger）、J. 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沃尔夫冈·伊瑟尔（Walfgang Iser）、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后来应老朋友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之邀赴杜克大学参加学术会议，在他的安排下又结识了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费兰克·伦屈夏（Frank Lentricchia）和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W. Said）等人。这期间因编选《最新西方文论选》的需要，与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及其他一些学者也有过通信往来。通过与他们交流和阅读他们的作品，我发现这些批评家或理论家各有所长，他们的理论思想和批评建构各有特色，因此便萌发了编译一批当代批评理论家的“自选集”的想法。1988年5月，J. 希利斯·米勒来华参加学术会议，我向他谈了自己的想法和计划。他说“这是一个绝好的计划”，并表示将全力支持。考虑到编选的难度以及与某些作者联系的问题，我请他与我合作来完成这项计划。于是我们商定了一个方案：我们先选定十位批评理论家，由我起草一份编译计划，然后由米勒与作者联系，请他们每人自选能够反映其思想发展或基本理论观点的文章约50万至60万字，由我再从中选出约25万至30万字

的文章，负责组织翻译，在中国出版。但1989年以后，由于种种原因，这套书的计划被搁置下来。1993年，米勒再次来华，我们商定，不论多么困难，也要将这一翻译项目继续下去（此时又增加了版权问题，米勒担保他可以解决）。作为第一辑，我们当时选定了十位批评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保罗·德曼（Paul de Man）、德里达、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伊瑟尔、费什、詹姆逊、克里格、米勒和赛义德等。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决定独家出版这套书，并于1996年签了正式出版合同，大大促进了工作的进展。

为什么要选择这些批评理论家的作品翻译出版呢？首先，他们都是在当代文坛上活跃的批评理论家，在国内外有相当大的影响。保罗·德曼虽已逝世，但其影响仍在，而且其最后一部作品于去年刚刚出版。其次，这些批评理论家分别代表了当代批评理论界的不同流派或不同方面，例如克里格代表芝加哥学派或新形式主义，德里达代表解构主义，费什代表读者反应批评或实用批评，赛义德代表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德曼代表修辞批评，伊瑟尔代表接受美学，米勒代表美国解构主义，詹姆逊代表美国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伊格尔顿代表英国马克思主义和意识形态研究。当然，这十位批评理论家并不能反映当代思想的全貌。因此，我们正在商定下一批批评家和理论家的名单，打算将这套书长期出版下去，而且，书籍的自选集形式也可能会灵活变通。

从总体上说，这些批评家或理论家的论著都属于“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y）范畴。那么什么是批评理论呢？虽然这对专业工作者已不是什么新的概念，但我觉得仍应该略加说明。实际上，批评理论是60年代以来一直在西方流行的一个概念。简单说，它是关于批评的理论。通常所说的批评注重的是文本的具体

特征和具体价值，它可能涉及到哲学的思考，但仍然不会脱离文本价值的整体观念，包括文学文本的艺术特征和审美价值。而批评理论则不同，它关注的是文本本身的性质，文本与作者的关系，文本与读者的关系以及读者的作用，文本与现实的关系，语言的作用和地位，等等。换句话说，它关注的是批评的形成过程和运作方式，批评本身的特征和价值。由于批评可以涉及到多种学科和多种文本，所以批评理论不限于文学，而是一个新的跨学科领域。它与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有这样那样的联系，甚至有某些共同的问题，但它有自己的独立性和自治性。大而化之，可以说批评理论的对象是关于社会文本批评的理论，涉及到文学、哲学、历史、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建筑学、影视、绘画，等等。

批评理论的产生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60年代以来，西方进入了所谓的后期资本主义，又称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跨国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化之后的时期或后现代时期。知识分子在经历了60年代的动荡、追求和幻灭之后，对社会采取批判的审视态度。他们发现，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文学艺术，出现了种种充满矛盾和悖论的现象，例如跨国公司的兴起，大众文化的流行，公民社会的衰微，消费意识的蔓延，信息爆炸，传统断裂，个人主体性的丧失，电脑空间和视觉形象的扩展，等等。面对这种情况，他们充满了焦虑，试图对种种矛盾进行解释。他们重新考察现时与过去或现代时期的关系，力求找到可行的、合理的方案。由于社会的一切运作（如政治、经济、法律、文学艺术等）都离不开话语和话语形成的文本，所以便出现了大量以话语和文本为客体的批评及批评理论。这种批评理论的出现不仅改变了大学文科教育的性质，更重要的是提高了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辨析问题的能力。正因为如此，批评理论一直在西方

盛行不衰。

我们知道，个人的知识涵养如何，可以表现出他的文化水平。同样，一个社会的文化水平如何，可以通过构成它的个人的知识能力来窥知。经济发展和物质条件的改善，并不意味着文化水平会同步提高。个人文化水平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阅读的习惯和质量以及认识问题的能力。阅读习惯也许是现在许多人面临的一个问题。传统的阅读方式固然重要，但若不引入新的阅读方式、改变旧的阅读习惯，恐怕就很难提高阅读的质量。其实，阅读方式也是内容，是认知能力的一个方面。譬如一谈到批评理论，有些人就以传统的批评方式来抵制，说这些理论脱离实际，脱离具体的文学作品。他们认为，批评理论不仅应该提供分析作品的方式方法，而且应该提供分析的具体范例。显然，这是以传统的观念来看待当前的批评理论，或者说将批评理论与通常所说的文学批评或理论混同了起来。其实，批评理论并没有脱离实际，更没有脱离文本；它注重的是社会和文化实际，分析的是社会文本和批评本身的文本。所谓脱离实际或脱离作品只不过是脱离了传统的文学经典文本而已，而且也并非所有的批评理论都是如此，例如詹姆斯那部被认为最难懂的《政治无意识》，就是通过分析福楼拜、普鲁斯特、康拉德、吉辛等作家作品来提出他的批评理论的。因此，我们阅读批评理论时，必须改变传统的阅读习惯，必须将它作为一个新的跨学科领域来理解其思辨的意义。

要提高认识问题的能力，首先要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这就需要像经济建设那样，采取一种对外开放、吸收先进成果的态度。对于引进批评理论，还应该有一种辩证的认识。因为任何一种文化，若不与其他文化发生联系，就不可能形成自己的存在。正如一个人，若无他人，这个人便不会形成存在；若不将个人置

于与其他人的关系当中，就不可能产生自我。同理，若不将一国文化置于与世界其他文化关系之中，也就谈不上该国本身的民族文化。然而，只要与其他文化发生关系，影响就是双向性的；这种关系是一种张力关系，既互相吸引又互相排斥。一切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与其他文化的联系；只有不断吸收外来的新鲜东西，才能不断激发自己的生机。正如近亲结婚一代不如一代，优种杂交产生新的优良品种，世界各国的文化也应该互相引进、互相借鉴。我们无需担忧西方批评理论的种种缺陷及其负面影响，因为我们固有的文化传统，已经变成了无意识的构成，这种内在化了的传统因素，足以形成我们自己的文化身份，在吸收、借鉴外国文化（包括批评理论）中形成自己的立足点。

今天，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资本的内在作用或市场经济和资本的运作，正影响着世界经济的秩序和文化的构成。面对这种形势，批评理论越来越多地采取批判姿态，有些甚至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因此一些保守的传统主义者抱怨文学研究被降低为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对文本的分析过于集中于种族、阶级、性别、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等非美学因素。然而，正是这种批判态度，有助于我们认识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内在逻辑，使我们能够在全球化的形势下，更好地思考自己相应的文化策略。应该说，这也是我们编译这套丛书的目的之一。

在这套丛书的编选翻译过程中，首先要感谢出版社领导对出版的保证；同时要感谢翻译者和出版社编辑们（如白桦、汪民安等）的通力合作；另外更要感谢国内外许多学者的热情鼓励和支持。这些学者们认为，这套丛书必将受到读者的欢迎，因为由作者本人或其代理人选择的有关文章具有权威性，提供原著的译文比介绍性文章更能反映原作的原汁原味，目前国内非常需要这类新的批评理论著作，而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无疑会对这套

丛书的质量提供可靠的保障。这些鼓励无疑为我们完成丛书带来了巨大力量。我们将力求把一套高价值、高质量的批评理论丛书奉献给读者，同时也期望广大读者及专家学者热情地提出建议和批评，以便我们在以后的编选、翻译和出版中不断改进。

王逢振

1997.10. 于北京

前言 探索消费的斯芬克斯之谜

让·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一书的开篇写道：

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富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恰当地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我们生活在物的时代：我是说，我们根据它们的节奏和不断替代的现实而生活着，在以往所有的文明中，能够在一代一代人之后存在下来的是物，是经久不衰的工具或建筑物，而今天，看到物的产生、完善和消亡的却是我们自己。^①

消费社会就是这样一个被物所包围，并以物（商品）的大规模消费为特征的社会，这种大规模的物（商品）的消费，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改变了人们的衣食住行，而且改变了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改变了人们看待这个世界和自身的基本态度。换言之，生活在消费社会中的人们和他们的前辈的根本差

^① 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第1—2页，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异，并不在于物质需要以及满足这种需要的方式有了改变，而在于今天人们的生活目的、愿望、抱负和梦想发生了改变，他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发生了改变，最终是作为人的本体的存在方式发生了改变。

因此，这种改变不仅是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形式的转变，同时也是一种整体性的文化转变。有学者认为，就其给人类生活带来的深刻影响而言，这场转变的历史重要性甚至超过了 20 世纪一些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如两次世界大战、东西方之间持续数十年的冷战等等。这场转变首先发生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它并不是西方国家特有的社会和文化现象。作为今天西方文化中占支配地位的文化再生产模式，消费文化被作为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商业以及令人艳羡的西方生活方式的代表推销到世界各地，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即使我们今天置身于世界上最偏僻的角落，也能呼吸到它的气息，蒙受到它的影响。

由于消费在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中日益重要和显著的作用，近 20 年来，对消费文化的研究也逐渐从学术研究的边缘进入为中心，受到来自不同学科、属于不同理论派别的学者的广泛关注。他们关注的主要问题有：消费社会的出现与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有着什么样的内在联系？消费文化为什么会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占支配地位的文化再生产模式？消费文化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增加了个人的自由，还是加强了社会的控制？在消费社会，商品的性质和价值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它强化或削弱了哪些特定的社会关系？维护或剥夺了哪些特定的社会阶级、集团的利益？个人和团体能否对消费文化进行有效的抵抗？等等。我认为，在对消费文化的众多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人类学与社会学构成了三种最重要的路向，本文将要介绍的，就是他们的一些研究成果。

一 消费社会:从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

消费社会究竟始于何时？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对这个问题也可以提供一个非常简单的答案：它始于 1913 年福特汽车公司设在密西根德尔朋的生产流水线隆隆驰下第一辆汽车之时。

20 世纪大众消费社会的整体性兴起与以福特主义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大规模工业生产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的总体消费水平是由该社会体系中劳动力的再生产和该社会体系自身的再生产两种因素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也不例外。它的消费水平主要受到下面两种因素的制约。一方面，在保证劳动力再生产的前提下，资本家总是力求以尽可能低廉的生产成本获取尽可能丰厚的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工人获得的工资必须能够构成有效需求。这种需求能够实现资本主义劳动生产出来的产品的价值。

很显然，这两个目标并不完全吻合，为了同时达到上述目标，资本主义必须寻找到能够使二者趋于平衡的“调节模式”，而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就是 20 世纪资本主义用来平衡二者关系的两种最重要的“调节模式”。关于福特主义的最重要的研究出自法国调节学派的两位理论家：米歇尔·阿吉列塔与阿兰·列别策。他们的基本观点是：生产与消费的联接（articulation）对于资本主义再生产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旦联接的链条中断，就会爆发经济危机。但每一种联接方式都有自己的极限。一旦达到或超过这种极限，就会有新的联接方式取而代之。阿吉列塔指出，如果从消费的角度看，资本主义“不仅改造了劳动过程，也改造了劳动力再生产的过程”，它生产出一种新的“工薪阶级的消费

模式，而且将这种消费模式结合进生产的条件”^①。但是这种新的消费模式直到 20 世纪才获得重大的发展。原因在于，尽管早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迫使工人与生产工具相分离，使之成为工资劳动者，却并未彻底改变其消费模式。工人的家庭消费并不完全依赖于商品，他们自己缝制衣服，种植蔬菜，饲养家禽，用来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而在当时，商品消费的不发达并未构成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因为它的当务之急是资本商品（劳动部门 1）而不是消费商品（劳动部门 2）的生产，工资劳动者并不构成钢铁、煤炭、化工产品等等的主顾，而正是这些产品在当时构成了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

但在 19、20 世纪之交，这种情形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它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从生产资料逐步过渡到生活资料的生产，除非汽车生产创造出对钢铁的更大需求，钢铁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就会受到限制。这时大规模的商品消费就构成了资本主义发展中关键的一环。这种变化要求工人消费的基本对象必须是从市场上购买来的商品，而不再是家庭内部自给自足的劳动产品。第二，与此相联系的另一个转变是生产过程本身的转变。阿吉列塔将之概括为资本家从榨取工人的“绝对剩余价值”到“相对剩余价值”的转变。（前者是指资本家通过延长工人的工作时间来提高利润，后者是指资本家通过提高工人在同一单位时间的劳动效率来增加利润）。福特主义就是这一转变的产物，福特制是和所谓“泰勒制”紧密联系在一起。泰勒是 19 世纪末美国一位工人出身的工程师，由于自下而上的工作经历，他对机器大生产的各个环节都非常熟悉。他设计出一套精简的工作程序，其基本原则就是精确计算工

^① M. 阿吉列塔《资本主义调节理论：美国经验》，第 24 页，伦敦，1979 年，英文版。

作中的必要动作和时间，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动作，让工人按规定的标准时间完成工作量，工资与完成工作量挂钩。1913年，福特对“泰勒制”加以改进和完善，发明了依靠非熟练工人在中心装配线上使用通用零部件的大规模生产方式，设计完善的装配线和统一精确的通用零部件降低了对工人手工技能的要求，同时也使工人失去了对自己劳动的控制，哪怕在最小的细节上也被迫从属于生产过程。由于失去对工作节奏的控制，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失去了任何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成为了装配线上的一个固定零件，这种现象即是韦伯、齐美尔、卢卡奇等思想家一再描述过的资本主义特有的“理性化”和“物化”。

伴随着福特主义的扩张，这种“理性化”与“物化”的倾向逐步从劳动过程扩展到日常消费领域，福特制不仅改变了劳动过程，也改变了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从表面上看，消费是不受国家和经济体制干预的个人行为，但正如阿吉列塔所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消费“仍然从属于恢复在社会实践中被消耗掉的精力这一普遍逻辑”。“福特制”和“泰勒制”使工人的劳动强度大大增加，使其没有余裕和闲暇在工作时间内恢复体力，这就导致筋疲力尽的工人在下班之后不再可能去从事生活资料的家庭生产。生产劳动与家庭生活被完全割裂开来。工人消费的一切都必须依赖于商品。阿吉列塔写道：“在历史上，福特主义第一次创造了一种工人阶级的消费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个人对商品的占有支配了消费的具体实践。”

这种消费模式正是以福特主义为代表的现代化大工业生产所需要的。福特主义使生产进入标准化、规模化的新阶段，大批量生产构成了福特主义的时代特征，而大规模的生产必然要求大规模的消费。现代家庭消费的两个最重要的项目，标准化的住宅和汽车，作为同质化、齐一化的大众消费品，恰恰体现了福特主义

的生产逻辑在消费领域的延伸。

生产与消费领域发生的变化，带来了社会阶级关系的重新调整。资本家为了最大限度地攫取利润，总是力图使工人的工资维持在最低水平，但在福特式大规模生产的条件下，这样做必须满足两个基本的前提：一、劳动者愿意接受这种高强度的劳动；二、大规模生产的产品能够销售出去。这就导致了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新的谈判，谈判的结果是，工人同意放弃工作时间以内的其他权力，同意服从苛刻的劳动纪律。反过来，劳动者要求增加工资，而只要这种增加不会从总体上威胁到资本家的利润，同时还可以有效地刺激需求，那么对于资本家来说就是可以接受的，政府也乐于支持这样的妥协，因为它一方面大大减低了对现存社会秩序的结构性的威胁，另一方面通过充分就业和合理的工资，降低了政府的福利支出。^①

福特主义“一天工作8小时，挣5美元”的口号，使工人有能力支付汽车、住宅等标准化商品。这样资本主义就用提高生活标准的策略达到了一箭双雕的目的。一方面它确保市场能够及时地吸收和消化大规模、大批量生产出来的商品，避免了产品过剩引发的经济危机；另一方面又保证了社会的政治稳定。它用消费领域的自由和相对丰富的商品贿赂工人，使之放弃了对异化劳动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抗争，正是针对这一现象，葛兰西写道，福特主义“以一种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前所未有的目的意识，以迄今为止最大的集体努力，在创造一种新型的工人和新型的人，使之适应于新的工作和生产过程”^②。在葛兰西看来，现代消费

^① 参见D. 施奈特《消费文化与现代性》，第175—209页，剑桥，1997年，英文版。

^② 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葆煦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03页，译文有改动。

主义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再生产以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体系再生产的一种新形式。

福特主义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组织方式，也是工业化时代资本积累的主要形式。但从 20 世纪 60—70 年代以来，福特主义生产方式逐渐暴露出某种深刻的结构性危机。借用大卫·哈维的话说，它的弊端，一言以蔽之，就是僵化 (rigidity)^①。福特式大规模生产体系需要长期和庞大的固定资本投资，很难适应迅速变化的市场需要，而高产量和低单位成本的生产方式要求售出大量产品，又与日趋多样化和日趋饱和的市场发生矛盾，同时线性的生产方式缺乏横向的协调机制，也造成了生产组织的僵化。这种种僵化反映出作为一种协调生产与消费的控制模式，福特主义已经达于它的极限。为了克服福特主义的死板和僵化，一种被称为“灵活积累”的新的调节模式应运而生，它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它从生产针对大众市场的标准化产品转向生产针对“目标消费群体”的小规模、小批量的产品，因而能够灵活地满足市场的需要；第二，它缩短了生产周期，“灵活积累”模式使生产的概念远远超出生产流水线的范围，它采用新的信息技术来联接生产与销售，以适应后现代社会迅速变化的时尚与趣味，其结果是大大缩短了生产和销售的周期，加速了资本流通；第三，在劳动过程方面，“灵活积累模式”逐步摆脱了“泰勒”式的狭隘观念，不再把工人仅仅看作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力”，看作工厂这一巨大齿轮上的螺丝钉，而是更加重视工人在劳动中的个性和创造性，劳动时间也更为灵活。这种“灵活积累”模式又被称作“后福特主义”，它用机会经济取代了规模经济，在劳动力市

^① 参见大卫·哈维《后现代性的条件》第 9 章“从福特主义到灵活积累”，第 141—172 页，剑桥，1990 年，英文版。